

今文经学是否促成了层累说？

——层累说提出一百周年之际的思考

范 静 静

〔摘要〕层累说的现代性争议衬托出其作为转型期理论的魅力。关于层累说的最初批评并不牵连今文经学。“今文经学促成说”始于《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之后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阶段，径直向层累说对托古改制说的借用发难。愈演愈烈的风势逐步殃及层累说的条条立论，学术史与思想史夹击下的清理式阐释似让层累说再难摆脱今文经学的烙印。但现有解释与彼时境况的多重冲突要求重新理解二者关系。以正向叙事回归顾颉刚本身，经由历时的缕述发现层累说提出时期，顾颉刚对今文经学的态度并不像如今认定的那般紧密，托古改制说亦未得其青睐，保持相当程度的疏离才是二者间的真实样态。这一情形有所变化始于层累说提出之后，托古改制说、甚至刘歆造伪说均被用作丰富层累说的借力，顾颉刚也不再吝啬对今文经学的肯定。将今文经学之于层累说的影响由推动性倒置为源头性的行为即由此发生。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并不同质，它们对何为历史事实的不同判定是分离二者的最佳说明。谈论其关系若以断裂性为前提，或许更能呈现层累说作为现代史学命题的主体性价值。

〔关键词〕层累说；今文经学；顾颉刚；古史辨；托古改制说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23)02-0115-15

1923年5月6日，层累说横空出世。一百年以来，在这片富含学术力、思想力、理论力的探方里，学者们的考证和发掘从未停歇。这种多层次、高密度、全方位的掘地式探索，似乎已经让层累说研究题无剩义。单就层累说的来源一题，内溯疑辨传统与外寻域外因子，精耕细作之下还有多少余地可挖？勘探殆尽的畛域中是否存在偏差？这些问题仍然值得再思量。其中一支研究将今文经学视作层累说的来源之一。顾颉刚因承今文经学而饱受诟病，首当其冲的便是作为古史辨方法底色与核心理念的层累说，那么二者间的联系则直接关乎如何审视古史辨与今文经学的关系，进而如何评价古史辨的学术价值这一更为宏大的重要问题。揆诸既有研究，此种联系得以建立所依据史料的适用性如何？以二者间学术观点或思想线索的相通作为关系成立的凭借是否存有逻辑漏洞？再者，今文经学在层累说的生成阶段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这一影响究竟是源头性的还是推动性的、深化性的？如若这一联系难以坐实，讨论中的歧误又是从何而起？这些疑点尚有继续发掘的空间，本文将努力进行一番探索。

一 倒置的时序：“今文经学促成说”的阐释理路

层累说与今文经学联系的初步确立，发生在层累说面世七年之后^①。最早明确表达“今文经学促成说”者或是梁园东。他指出层累说判定真书为伪的根本原因之一是顾颉刚“误会了康有为‘孔子托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17ZDA196)。

① 层累说公开面世后，在梁园东之前，较早明确提出今文经学是古史辨来源之一者有孙福熙，其言顾颉刚智识的来源有康有为与《新学伪经考》，之后曹养吾也谈到顾颉刚之治学稍稍受到康有为的影响。层累说开启了古史辨，并游走于整个古史讨论。在此过程中，层累说自身也随之调整、完善，即层累说具有阶段性特征。尽管作为古史辨组成部分的层累说在来源上可能与古史辨的来源有所重合，但笼统地将二者来源进行等同并不合适，所以如孙福熙、曹养吾以及其后笼统述及这一问题者，暂不纳入本文讨论（参见孙福熙：《古史辨第一册》，《北新》第1期，1926年8月21日，第12页；曹养吾：《辨伪学史——从过去说到最近的过去》，《水荇》第1卷第1期，1928年5月，第13页）。

古改制’说的意思”，直将“托古改制”误作“伪造古制以壮声势”^①，并举《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里如何排列尧、舜、禹一例，重申“若不是了解顾君是在误解了康有为的‘孔子托古改制说’，就绝不会明白顾君何以会产出这样奇怪的见地”^②。虽然梁园东一直强调顾颉刚误会了康有为，但这并不妨碍反向证明今文经学是层累说的来源之一。梁园东的态度很明确，他直接指向托古改制说之于层累说的影响，没有牵扯刘歆造伪说；同时指出“‘托古改制说’应用的限度且不谈他，只是由他的流弊，竟会产出顾君这样见地时，那就连托古改制说也有改正的必要”^③，从中可见他对二者间的联系并不满意。

与梁园东有别，钱穆认为“顾先生传说演进的古史观”，“对晚清今文学家那种辨伪疑古的态度和精神，自不免要引为知己同调。所以古史辨和今文学，虽则尽不妨分为两事，而在一般的见解，常认其为一派，而顾先生也时时不免根据今文学派的态度和议论来为自己的古史观张目”^④。回到此言语境，钱穆是就《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而发，介意的是层累说中的“造成”一意，尤其是刘歆造伪说，而这恰恰源自今文经学。梁园东与钱穆皆主张层累说借力于今文经学，但对二者的看法却大致呈相反之势。梁园东全面否定层累说的方法价值，视之作为一种完全的“臆测”与“捉摸”^⑤，钱穆则对历史演进原则表示肯定。如果说梁园东尚对托古改制说存有一丝宽容的话，那么钱穆对刘歆造伪说的批评则毫不留情。

其后，署名沅思的学者谈到，在层累说的提出过程中，顾颉刚“推翻古史之动机，亦复因康有为之《孔子改制考》而启发焉”^⑥。对于层累说，沅思立场鲜明地站在梁园东一边。其文虽在观点上无甚新意，但证成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关系的方式却值得注意。《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在此受到了特别关注，顾颉刚的自述被明确用作证明二者间联系的依据，而这一点不见于梁园东与钱穆的论述中。

比梁园东更严厉的批判来自马乘风。他提出层累说的理论根基是“中国古史完全是战国时代的人所伪造”，而这“是康有为圣人‘托古改制’说之更大胆‘更无理取闹’的广泛的应用”^⑦，是故层累说出于今文经学且更胜之。与沅思一样，马乘风开篇即言梁园东的见解较刘掞藜高明许多。比梁园东更进一步，马乘风并不局限于《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而是充分利用《古史辨》所录篇目向层累说全线开火，“无理取闹”判语的出现表明，在他看来层累说的学术价值远低于今文经学，甚至毫无学术价值可言。

这些初起于 20 世纪 30 年代的声音很难被称作严格意义上的“阐释”。对他们而言，层累说尚属“当代史”，其更多的是以介入历史进程的参与者而非旁观的研究者身份，或出于立场与学术观点的不同，在“商榷”“评议”甚至是“批判”中进行“阐释”。身处历史现场的反馈虽然会受到某些不可控的偏见或预设的制约，但同时也会提供最贴近本然历史的当时感^⑧，成为后来研究的重要参照。从早期的讨论中，可以勾勒出时人的三种取向：一是以前期《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为中心论托古改制说之源，二是集中在中期《古史辨》第一册《自序》确定今文经学与层累说之关系，三是聚焦于后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谈刘歆造伪说之源。这三种取向的共同原是对“造成的古史”的质难。换言之，虽然他们对“层累的古史”意见不一，但在“造成的古史”上却达成一致，并都认为“造成的古史”这一点是从今文经学那里讨来的。以“造伪”作桥梁，层累说与今文经学的关系就此绑定。之后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大致遵循了以上取向。如果说“遵循”一词含有某种附和色彩的话，那么也可以说后来

① 梁园东：《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东方杂志》第 27 卷第 22 号，1930 年 11 月 25 日，第 73 页。

②③⑤ 梁园东：《古史辨的史学方法商榷》（续二十二号），《东方杂志》第 27 卷第 24 号，1930 年 12 月 25 日，第 86、86、89 页。

④ 钱穆：《评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大公报·文学副刊》第 170 期，1931 年 4 月 13 日，第 10 版。《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是层累说的进一步发展，层累说作为古史辨的基本方法必定贯穿于顾颉刚对五德终始说的阐释中，如前所述，尽管二者在来源上有所重合，但不能简单地进行等同，所以若非明确谈到《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中有关层累说者，亦不纳入本文讨论。

⑥ 沅思：《近代古史研究鸟瞰》，《无锡国专季刊》第 1 期，1933 年 5 月，第 35 页。沅思或为某位学者笔名，但暂未查实。

⑦ 马乘风：《中国经济史》第 1 册，南京：中国经济研究会 1935 年版，第 507 页。

⑧ “‘距离太近’的历史是本然的历史，而‘文献’上的历史则是前人记录整理后的结果，——后者事实上已经存在着一种秩序或‘整体感’了。”（王学典：《当代史研究的开展刻不容缓》，《山东社会科学》2009 年第 11 期，第 30 页）

者与之达成了共识^①。

50至70年代末的代表性观点出自杨向奎。“他不愿意人家称道他是‘经师’，而喜欢说自己是史学家，事实上他是‘通经治史’，走的是‘公羊学派’的老路，并不是干干脆脆的史学家”^②，第一次对顾颉刚的学术身份提出质疑者似是杨向奎。在此之前，顾颉刚的史家属性从来不曾构成一个“问题”^③，从梁园东至马乘风也从未将顾颉刚归入经家阵营，杨向奎的评价直接导致了顾颉刚身份认知危机，由此开启的顾颉刚是传统经师还是现代史家的争论时至今日仍有余波。杨向奎首次综合了前述所总结的三种取向，以此说明层累说及作为其发展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皆承今文经学而起，不能成立且毫无价值，并进一步指出顾颉刚的疑古精神是接受了今文经学的法宝。如此一来，层累说与今文经学的关系似已牢不可破^④。站在批胡运动的漩涡，学术判断难免受到影响，但从其时隔多年的再论述看，今文经学影响了层累说这一点始终为其所坚持^⑤。

顾颉刚去世后，刘起釭较早述及此问题，他关注的重点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与钱穆相一致，刘起釭耿耿于层累说中的今文经学因子，认为“运用历史演进及传说流变的眼光来研析历史”，“符合旧史形成的实际情况，因而是正确的。现在顾先生舍弃自己这一正确方法，却轻于相信清末今文家并无确证的主观臆说，确是有失慎重”^⑥。更重要的是，与之前学者偏重顾颉刚对今文经学的采纳形成对比，刘起釭开始强调顾颉刚对今文学家治学态度的摒弃，并再次定位顾颉刚为现代史家。在学术话语重启的语境下，刘起釭的表态将对此问题的讨论拉回正轨。截至21世纪初，大陆学界关于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关系的研究亦逐步展开^⑦。

与此同时，港台学者的研究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新视角。许冠三的创见在于，提出作为层累说核心方法构成的伪史移用法原出康有为但又经过顾颉刚的发展，并谈到顾颉刚“在《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和《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等长篇专论中，他曾放手运用此法。不幸，由于他过信‘托古改制’的假说，在许多推想与解释上不免失之于粗疏，甚至流于武断”^⑧。伪史移用法是理解层

-
- ① 相关文章参见魏应麒：《中国史学史》，长沙：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285页；李季：《古史辨的解毒剂》，《求真杂志》第1卷第1期，1946年5月1日，第32页；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1949年10月，第27页。
- ② 杨向奎：《“古史辨派”的学术思想批判》，《文史哲》1952年第2期，第34页。
- ③ 在杨向奎之前，胡适曾依《古史辨》第一册《自序》说到顾颉刚“曾做古文家的信徒，又变为今文家；他因为精神上的不安宁，想求一个根本的解决，所以进了哲学系；在哲学系里毕业之后，才逐渐地回到史学的路上去”。总体上看，胡适不否认顾颉刚的史家身份[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续），《现代评论》第4卷第92期，1926年9月11日，第15页]。
- ④ 相关文章还可参见童书业：《批判胡适的实验主义“考据学”》，《光明日报》，1955年2月3日，第3版；周策纵：《五四运动史：现代中国的知识革命》（Chow Tse-t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Revolution in Modern China*），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314~315页。需要一提的是施耐德，他分析了今文经学给予顾颉刚的启示，指出顾颉刚在处理文本与史学问题时直接受到康有为的影响，而且《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对顾颉刚的感染力极大。从中可以推定层累说在某种程度上与今文经学有关，但这一联系在施耐德那里并没有得到明确阐发[参见施耐德：《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与取代中国传统方案的探索》（Laurence A. Schneider, *Ku Chieh-kang and China's New History: Nationalism and the Quest for Alternative Traditions*），洛杉矶、伦敦：加州大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9页]。
- ⑤ 近30年后，杨向奎的态度不再如此激烈，但仍坚持层累说“采用了康有为的某些观点”“受有清代经今文学派的影响”（杨向奎：《论“古史辨派”》，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22页）。
- ⑥ 刘起釭：《顾颉刚先生学述》，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82页。
- ⑦ 相关文章参见李民：《可贵的治学精神——悼念顾颉刚先生》，《郑州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第82页；刘俐娜：《顾颉刚与古史辨派》，《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4期，第165~166页；余兼胜：《顾颉刚古史观的形成与其古今文经学认识的关系》，《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第3期，第28页；顾潮：《略论顾颉刚先生研究古史的方法》，《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第162页；钱婉约：《“层累地造成说”与“加上原则”——中日近代史学上之古史辨伪理论》，《人文论丛》1999年卷，第441页；赵利栋：《古史辨》与《古史新证》——顾颉刚与王国维史学思想的一个初步比较》，《浙江学刊》2000年第6期，第110页；田旭东：《20世纪中国古史研究主要思潮概论》（博士学位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01年，第66~67页；周国栋：《现代学术与两种遗产》，《齐鲁学刊》2002年第2期，第141页；李锦全：《如何正确理解“层累造史”理论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广东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80~81页；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54页；吴少珉、赵金昭主编：《二十世纪疑古思潮》，北京：学苑出版社2003年版，第77页。
- ⑧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上册，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页。许冠三的国籍暂未查实，此处沿用通行说法，将其归入港台学者。

累说与今文经学关系的关键,但稍有遗憾的是许冠三并未呈现此法何以原于康有为又何以经顾颉刚发展的内在理路。

之后,王汎森试图探索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历史观之间的思想联系,指出顾颉刚坚持刻意造伪说与“古史辨一开始就带有全盘‘抹煞’上古信史的精神”^①这两点皆从今文经学而来。在他之前,以“造伪”关联二者的说法已屡见不鲜,而预设先行、先有成见横亘于心这一点也早已见于梁园东的表述中。如果说此前的研究属于提纲式,那么王汎森的推进便是首次将提纲细目化,通过细致对比层累说与今文经学之异同来证成己说。或许正因如此,是著的被接受程度与被征引率都高于其他论著,明显影响了后来者对此问题的书写。微观考索有助于增强说服力,但同时也冒有一定风险,其观点能否经得起事实与逻辑的验证尚有考察余地。时隔四年,彭明辉从伪史移用法、刻意造伪与先有成见三个方面说明了今文经学对层累说的影响,相关看法与许冠三、王汎森大体一致^②。

在纠正王汎森过分夸大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关系的论述中,陈志明见解值得重视。他不否认层累说深受康有为的影响,但认为“企图以顾氏曾使用了‘托古改制’‘新学伪经’等观念作理由,来夸大康、顾二人之间的关系是不恰当的”^③。陈志明认为我们应当认识到康有为与顾颉刚之间的背离,明确顾颉刚借用今文经学是在史学而非经学的前提下进行的,以此展现前者对后者的依袭、批判甚至超越。在“今文经学促成说”的框架下,陈志明开始反思二者间的关系在何种层次上具有合理性这一问题。若沿此方向继续深思,“今文经学促成说”或有被颠覆的可能。

新世纪以来,黄海烈对此问题的推动表现在史料扩充层面。他借助解读《顾颉刚读书笔记》,使得古史辨与今文经学的原有联系得以加固^④。之后的研究着意于某些具体问题。李锐与张凯先后谈到顾颉刚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中所持商周不同源一说出自今文经学^⑤,李长银论及顾颉刚关于禹是动物的判断来自“崔适的‘禹之本义为虫名’之说的直接启发”^⑥。在既有基础上继续细化深入,是近年来研究的主要特征^⑦。

近百年间关于今文经学与层累说联系的代表性观点大致如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诸家皆主张今文经学是促成层累说的原因之一而非唯一,绝大多数学者虽然在理解今文经学对层累说是何影响以及这种影响到了何种程度等问题上存在差别,但都不曾质疑顾颉刚的史家身份,这是继续讨论的总前提。纵观已有研究,今文经学得以促成层累说的关键在于,持此说者认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后半节“造成的中国古史”源出今文经学,且强调托古改制说在层累说生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在证成今文经学影响层累说的方式中,以二者间观点的相似性作为影响成立的根据是一种基本

①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第217页。

② 参见彭明辉:《疑古思想与现代中国史学的发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第63、165~166页。

③ 陈志明:《顾颉刚的疑古史学》,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3年版,第17页。

④ 参见黄海烈:《顾颉刚“古史层累说”初探》(博士学位论文),吉林大学2007年,第32~34、132页。

⑤ 参见李锐:《由新出文献重评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人文杂志》2008年第6期,第137页;李锐:《顾颉刚先生的“层累说”与经学史上的一个问题》,瞿林东、葛志毅主编:《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0~492页;张凯:《“超今文学”与近现代经史转型》,《浙江大学学报》2019年第2期,第214页。

⑥ 李长银:《由经入史:崔适的今文家言与“古史辨运动”》,《孔子研究》2021年第4期,第99页。在此之前,李长银提到“‘层累说’的提出,与夏曾佑《中国历史教科书》存在着一定的学术因缘”,夏曾佑的观点“为顾颉刚证成‘层累说’提供了重要的证据支撑”。他并未将夏曾佑归入今文经学阵营,而是偏重其新史学属性,将之视作古史辨四大源头之外(“传统的清代汉学、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晚清今文经学、以郑樵、姚际恒、崔述为代表的疑古辨伪传统以及胡适和钱玄同的引导与启发”)的第五个学术源头(参见李长银:《夏曾佑的“新史学”与“古史辨运动”》,《史学月刊》2020年第2期,第119~120、123~124页)。

⑦ 相关文章还可参见吴根友:《再论顾颉刚“疑古”思想的核心精神及其现代意义》,郑大华、邹小站主编:《中国近代史上的激进与保守》,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9页;郭延坡:《顾颉刚“层累说”理论体系的思想和方法》,《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第86页;赖国栋:《再论“层累说”的来源——兼谈历史与故事的距离》,《福建论坛》2013年第1期,第99页;葛兴苗:《顾颉刚“古史层累说”探析》(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大学2014年,第18页;王林栋:《古史辨易学辨正》(硕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5年,第14页;陈学然:《“重起炉灶”:民族危机与顾颉刚学术思想的转变》,《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62期,2016年1月1日,第167页;郭佳:《历史与神话的交融——近现代学术史视野下的顾颉刚禹夏研究》(博士学位论文),山东大学2019年,第118页;车行健、卢启聪整理:《顾颉刚先生逝世四十周年纪念座谈会——走在历史的路上:顾颉刚先生的疑经、辨史与采风》,《中国文哲研究通讯》第31卷第4期,2021年12月1日,第90页。

操作。自梁园东至许冠三,对此方式的运用非常简单,其中只有钱穆、杨向奎与刘起釭以寥寥数语比较了二者观点,着意于层累说完善阶段与刘歆造伪说的关联,余者如梁园东、马乘风与许冠三则存在将二者间的相似性视作无须特意证明的默认结论之倾向,偏重于层累说生成时期与托古改制说的联系。对这种粗线条论证方式的改变始自王汎森,他系统梳理了《古史辨》中与层累说相关的文章,尽可能地列出其中与今文经学有关者,还就大禹来源与“四个打破”等具体问题与今文经学相较,进而得出此为今文家言的“翻版”、与康有为之说“若相仿佛”、从今文经学那里“转手而来”的论断^①。自彭明辉至李长银,在王汎森所谈内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掘了层累说与今文经学的相似点。在偏于学术性的观点比较之外,二者间思想联系的建立使它们的关系更加紧密。有别于“学术”来源,以王汎森为代表的学者强调今文经学是层累说的“思想”背景、“思想”来源、“思想”根源,所谓二者间心意相通、精神结构类似、历史观念一致等是此种方式的核心表达。在他们看来,作为理论命题的层累说并不是经由对具体事实无休止的完全考证得出的,但反过来却对具体事实有普遍而深刻的解释能力,而今文经学同样如此,其最重要的两个概念工具,即托古改制说与刘歆造伪说也并不完全建立在对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的考证之上,却具有从整体上解构古文经学的破坏力,攻破一点即攻破全局是理论的特性所在,从这一意义上说,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共享着同样的结构内核。如果此种联系得以建立,那么层累说统摄下的具体议题则难以逃脱与今文经学有关这一逻辑设定。在此之外,若能得到顾颉刚的自证,对于坐实层累说与今文经学之联系无疑是强有力的助力,《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因而从幕后走至台前。该文被用作证据大致起于沉思,之后渐渐被学界广泛征引。因自述题材的特殊性,其重要性不言自喻,所自带的某种导向甚至定性作用,成为论定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关系的首要考虑。

证明二者间关系的方式大致不出以上所论,对此有几点问题尚有继续讨论的空间。不论是偏重知识的观点比较还是偏重观念的思想建构,抑或是采用顾颉刚自述作为内证,它们共同指向且突出今文经学对层累说的影响。那么,这种影响能否成立以及如何看待这种影响随之成为问题。更进一步考虑,若以福柯关于事件间连续性的批判来看,此种影响式的思考方式在问题阐释上具有何种层次的合理性也可以继续讨论^②。昆廷·斯金纳谈到“影响”成立的条件有三:“(A)甲(先行者)与乙(后行者)的教义之间必须具有真正的类似点。(B)乙不能在甲以外的著作中找到该教义。(C)即使具有某种类似性,能够证明乙受甲的影响,还必须能够证明乙不是独自阐明该教义。只有满足了这三个条件,才能主张甲影响了乙。”^③在“影响”成立的前提下,如果过度谈论“影响”则又会忽视被影响者的个性化选择与个体诠释力量^④。其独有逻辑的理路表达将于不自觉中被湮没,而且常常被规约为思想链条中的一环,成为线索式书写的牺牲品,此即福柯所警惕的“连续性”之弊。从这一视角检视今文经学“影响”层累说的论述,重新明确今文经学在哪些方面确实对层累说构成了“影响”,同时注意顾颉刚在接受今文经学“影响”过程中作为创新者而非模仿者的学术个性^⑤,这对于反思层累说与今文经学的关系不无益处。虽然如王汎森对“非连续性”持有不同意见^⑥,但这并不妨碍借此重审其说。此外,将自述作为证据,需要事先辨清顾颉刚在1926年对过去的追溯何种程度上合于1926年之前,尤其是1923年之前的实际,还须注意如何解读可能出现的事后回忆与当时事实存在的差别。史家的逻辑与

①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第56、63、207页。

② 福柯向事件间的联系、“贯穿这些事件的连续性”问题发起挑战,认为应当区分“解释的合理层次”“结构分析的合理层次”“因果关系的合理层次”。此处所言“何种层次的合理性”即立足于此(福柯著,董树宝译:《知识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2、6页)。

③ 转引自山口久和著,王标译:《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91页。

④ 参见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84页。

⑤ 王汎森曾说到“创新者”与“模仿者”的区别,并借此说明在“未来是已知”与“未来是未知”两种前提下展开逻辑思考的不同,认为“在未知状态中的创造,与后来的复制者所感知的完全不同”,创新者的努力及其特殊性不能与模仿者同日而语,应予以特别关注(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56~57页)。

⑥ 王汎森特意指出福柯“对思想史所处理的‘延续性’作相当严厉的攻击”,但坚持认为“思想史中的某些论题确具有因内在长期对话所构成之延续性”(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序,第8页)。

事件的逻辑并不完全一致^①,应留心时代错置的可能。

返回历史现场,同样有几处疑点有待解释。为什么言说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关系的声浪直到1930年才正式出现?即便是谈古史辨与今文经学的关系也要迟至1926年?这两个时间点,一是明确表达托古改制说与刘歆造伪说的《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刊出不久,一是载有《自序》的第一册《古史辨》刚刚出版。这样的时间差难免令人心生疑惑,既有研究是否将今文经学对层累说的推动性影响倒置为源头性影响?再者,层累说提出阶段与顾颉刚交往密切者非胡适与钱玄同莫属,他们二人对托古改制说与刘歆造伪说早有论述,尤其是钱玄同对此极为推崇,反观顾颉刚却鲜谈二说,也没有轻易接受他们的看法,种种表现似与今文经学保持着相当距离,那么如何以此证明今文经学对层累说的影响?

“今文经学促成说”的相关阐释是一种溯源式研究,“回溯性的追认”更多地表现为对显性历史的强调^②,同时借助后见之明呈现那些因“只缘身在此山中”而被隐去的角落,这一方式的合理性已无需多言。上述颇具冲击力的发问,指向已有讨论中可能存在的倒置问题。这要求尽量摆脱既定思考方式下的路径依赖,对层累说与今文经学的关系进行再说明。

二 回归正序:与今文经学保持距离的层累说

若要判断“今文经学促成说”是否存在倒置现象,那么便有回归正序再行估量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关系的必要。既有研究认为层累说中关于造伪的看法源于今文经学,并突出托古改制说在层累说提出阶段的重要地位。对此需要考察至层累说提出时,顾颉刚如何看待造伪与托古改制说。这直接关涉其对今文经学的态度,进而理解今文经学之于层累说究竟扮演了何种角色。

顾颉刚关于辨伪的看法最早或溯至作于1914年3月1日的《〈古今伪书考〉跋》。该文透露出两点信息:一是谈到今古文经书的真伪,指出“《古文尚书》之伪,梅君而后,百诗、松崖、懋堂、良庭辨说明矣。《周礼》颇见攻于晚近。而《易传》《仪礼》则终清一代盖无疑者”,《易传》《三礼》“虽有伪附,又不能定其著书之人,然终不当与虚造者等视”;二是在伪书成因上服膺章学诚之论,将其言概括为“师说”“后记”“挟持”“假重”“好事”“攘夺”“误会”七点,并自然而然地认同造伪现象的存在,同时承认无意成伪的可能^③。古文经书为伪的讨论远在今文经学复兴之前便已展开,同时是清中期以来非今文学家辨伪的要点,而且造伪一说在当时也早已是带有普遍意义的知识性认识。此外,康有为曾疑《易传》《仪礼》中有伪作这一点并未得到顾颉刚的注意,否则他便不会轻言“《易传》《仪礼》则终清一代盖无疑者”。由此来看,顾颉刚最初关于造伪的认识并不从今文经学中来,且从一开始便不否认无意成伪的存在,刻意造伪与无意成伪在他那里并行不悖。对于今文经学,虽然其经家学、章太炎国学讲习会以及北大受业等途径已经对此有所了解,甚至表现出了极强的求知欲,但从《〈古今伪书考〉跋》中尚看不到其受今文经学影响的痕迹。

1915年是顾颉刚正式认识今文经学的开始。是年年中,顾颉刚始获《新学伪经考》与《经学历史》。“长素先生集今文学之大成著此书”“二书足以握今文学之纲要”^④,从这些题识可以窥见其对今文经学的认知。在此前后,若想了解顾颉刚与今文经学的关系,其读书笔记是最直接的一手史料。从《寒假读书记》到《余师录》,提到今文经学的地方仅十余处,从中可见其对今文经学并不满意。最典型的一例是1915年5月左右,顾颉刚说到“驳其经学者,如叶焕彬等,我甚敬之。则以凭借之者深,而康为浅也”^⑤,认为叶德辉一派的经学素养较康有为深厚,对今文经学的学术价值表示了质疑。约略同

① 参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第49页。

②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思想史的写法》,第12页。

③ 顾颉刚:《〈古今伪书考〉跋》,顾颉刚主编:《古籍考辨丛刊》第1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41、243~245页。

④ 1915年5月5日,顾颉刚在为《增广翼教丛编》所作题识中言“久求《伪经考》不可得”,买到《新学伪经考》后,于七月初六日(8月16日)为是书撰写题识。因无法确定该书是否购于七月初六日,故暂将购买时间定在1915年5月6日至8月16日之间(参见顾洪、张顺华编:《顾颉刚文库古籍书目》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91页;解树明:《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及其学术价值》,《图书馆杂志》2019年第10期,第109页)。

⑤ 顾颉刚:《乙舍读书续记》,《顾颉刚读书笔记》第15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5页。

时,他指出造伪是“汉代经师之通性”,不必“独责于今文”,其中“附会窜易,虽古文大师如刘歆亦不免”^①。在这里,顾颉刚表达了类似刘歆造伪说的看法,但并无切实证据说明是言来自今文经学。“附会窜易”与“造伪”存在程度之别,并不能混为一事。另外,刘歆造伪说又非今文经学所持,胡宏、洪迈、方苞等已有论及,而且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再难找到顾颉刚言刘歆造伪说的记录,加之若按此前顾颉刚关于辨伪的观点,其产生如此想法也在情理之中。

顾颉刚受业于崔适期间,曾于1917年借阅其评点本《新学伪经考》,并在所作题识中言“其所点识,虽简少,要自得其精要者为我先导,所乐受也”^②。结合过录崔适评语的七处眉批,可以看到顾颉刚对今文经学确是用过心思。至胡适来信《询姚际恒著述书》之前,未再找到顾颉刚对崔适的其他评价。关于今文经学的整体态度亦如既往,仅有一处肯定之辞,谈到“国中为学主者,近世惟康长素与太炎先生,风从最众,建设最著”^③。回到此言语境,并不能据此轻易得出顾颉刚开始认同今文经学学术价值的判断。

《询姚际恒著述书》是顾颉刚走进古史辨的契机,辨伪逐渐成为其重心。此信后不久,顾颉刚于1920年11月24日提到某些伪书“只是存疑,并非作伪”^④,又于12月28日说到太公其人“或者竟是战国阴谋家造出来做他们的祖师的”^⑤。谈战国阴谋家伪造太公之前,顾颉刚曾在12月15日言及《周氏涉笔》中有疑《六韬》与太公事,周氏之论引起了他的注意,时隔十三天的重提概是对此思考的继续。且诸子出于战国,《汉书·艺文志》又载“《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⑥,顾颉刚的看法或与此有关。再根据此时他对今文经学为数不多的论述来看,这一观点似与今文经学的托古改制说没有直接关系。

1921年1月25日,顾颉刚首次明确指出王莽时期的造伪问题,以《汉书·王莽传》为依据提到“因于时势关系,出了不少的伪史。如少皞的一个人,就是到王莽时才成立的,其原因是因为想顶替了他的后代,去封国奉祀”^⑦。之后,其于1月31日概括造伪的原因有“装架子”“方士骗皇帝”“为抢做皇帝而造的符命”“学者的随情抑扬”“学者的好奇妄造”^⑧,又于7月24日至9月13日间说到造伪的原因还有“起于‘实用’一个观念”“过求古人深意”^⑨,继而还谈到“战国时无史可知,但大家极愿意借史事把自己主张发挥,所以大家勉力造史事”^⑩、《论语》时代不造伪但“到战国诸子,就难说了”^⑪,另于11月5日讲到“从前常以为战国横议,趁口乱道古事,造成了许多伪史。现在想想,战国时不但随便编造伪史,而且已在著作伪书了”^⑫。关于顾颉刚对待今文经学的态度,9月23日至24日,他指出清代疑《仪礼》者有顾栋高、姚际恒、毛奇龄等^⑬,对前述“《易传》《仪礼》则终清一代盖无疑者”一说进行了更正,但未提及康有为。此外,论及今文经学之处以强调康有为与崔适的辨伪目的是党争为主,涉及其学术性的地方主要有两点,一是说到康有为之书“无著专书特辟之者,半由理足,半亦近人怕读书耳”^⑭,二是于11月5日言“‘《六经》皆周公之旧典’一句话,已经给今文家推翻”^⑮。是年顾颉刚是否翻阅过今文经学著作不得而知,在记录大量所读书目的日记中未见有载,也或许读过但没有写入。综合顾颉刚关于造伪与今文经学的态度,其谈王莽时期伪史的根据是史书而非今文家言,所论造伪问题

① 顾颉刚:《余师录(二)》,《顾颉刚读书笔记》第15卷,第107页。

② 解树明:《顾颉刚批校本〈新学伪经考〉及其学术价值》,《图书馆杂志》2019年第10期,第109页。

③ 顾颉刚:《西斋读书记(一)》,《顾颉刚读书笔记》第15卷,第358页。

④ 顾颉刚:《致胡适》(1920年11月24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88页。

⑤ 顾颉刚:《致胡适》(1920年12月28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301页。

⑥ 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29页。

⑦ 顾颉刚:《论伪史及〈辨伪丛刊〉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⑧ 顾颉刚:《致胡适》(1921年1月31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305页。

⑨ 顾颉刚:《侍养录(四)》,《顾颉刚读书笔记》第1卷,第183、193页。

⑩ 顾颉刚:《景西杂记(一)》,《顾颉刚读书笔记》第1卷,第213页。

⑪ 顾颉刚:《景西杂记(二)》,《顾颉刚读书笔记》第1卷,第227页。

⑫⑮ 顾颉刚:《致钱玄同》(1921年11月5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535、535页。

⑬ 参见顾颉刚:《致马裕藻》(1921年9月23日—24日),《顾颉刚书信集》第2卷,第7~8页。

⑭ 顾颉刚:《景西杂记(三)》,《顾颉刚读书笔记》第1卷,第253页。

也没有明确牵扯托古改制说,仅靠两处提及今文经学学术性的内容亦难以认定他对今文经学的固有看法发生了质变。由此可见,今文经学并非顾颉刚关注的中心,他对今文经学的认同感也并不强烈,二者间的关系更谈不上紧密。那么,认为此时期顾颉刚言战国至汉代,尤其战国是造伪大本营这一点受教于今文经学的看法是否合适,就需要打上一个问号。

顾颉刚于1922年2月21日至4月8日间重申有些著作“并非有心作伪,乃无意之讹传”,还指出战国人伪造象刑与孟子解释三代征伐的共同原因是“要把唐、虞说成黄金时代”^①。3月29日,他第一次明确讲到托古改制说,其言“原来战国的学问家以及游说之士,都欢喜引用故事以证成他们的说话,而那时故书甚少,又不容易看见,得不到什么证据,所以只得杜造故典”,“尧、舜、禹、汤、文、武、周公,都是好模型里的人物,为托古改制的人所必须依附和赞叹的”^②,改制作作为造伪原因被公开提了出来。4月20日至6月2日间,其又有两次谈到托古改制说:一是“汉代实在还是托古改制的有思想”,《周礼》《王制》《月令》《春秋繁露》皆为“托古改制”而作;另一是“战国以后托古改制,战国以前托神改制”^③。是年顾颉刚仍未在日记中提及康有为的著作,与今文经学相关的记录仅2月14日至15日读皮锡瑞《诗经通论》一事^④,但录有此书并非是为特地了解今文经学,而是出于彼时研究《诗经》的需要。此外,其说到今文经学的地方似仅有一处,即于同月言及“打破伪书的如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⑤,由此可见今文经学依旧未得其青睐。这一时期,顾颉刚已明确论及托古改制说,似已真正接受了今文家言,但又很少谈到与今文经学相关的内容,其实此种情况只是看似矛盾实则并不冲突。记载尧舜禹至周公事迹的不只经书与子书,且顾颉刚否认孔子作六经,所以他没有特别指向孔子与诸子“托古改制”。早在写作《〈古今伪书考〉跋》时,顾颉刚便已涉及子书辨伪,但提到诸子造伪却在数年之后,首先被点名的是孟子,其余诸子则鲜被论及。从他关于孟子塑造舜之形象、夫妇伦理以及美化三代征伐等的叙述中,尚不能说其在孟子造伪与“托古改制”间建立了明确联系,而且孟子问题是作为孔子与《论语》问题的参照提出的,虽然顾颉刚谈到尧舜最早见于《论语》,但始终认为孔子只是“说尧、舜怎样的好,却没有造了事实去证明他的赞颂之言”^⑥,更没有述及孔子“托古改制”。另外,在其读书笔记所录《象刑》《战国时顺时势与逆时势之学派》等条中也并没有清楚地论述这一点。关于《周礼》《王制》《月令》《春秋繁露》,康有为认为《周礼》《月令》是刘歆伪作而《王制》作于孔子,但顾颉刚不持此说,谈《周礼》《王制》为“托古改制”之作或据《汉书·王莽传》“发得周礼,以明因监”^⑦与《史记·封禅书》“使博士诸生刺《六经》中作《王制》”^⑧而来。由此,顾颉刚只是将托古改制说视作诸多造伪原因中的一种,与其他造伪原因并列而不含有任何超出此范畴的特殊意味,与今文经学之托古改制说不在同一层面,可以说是名同质异。这样看来,前述顾颉刚谈论托古改制说与鲜言今文经学之间的“看似矛盾”便得到了解释,也再次证明了直至此时今文经学仍未进入顾颉刚知识体系的核心圈。

1923年5月6日,《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刊出,文中关于禹之属性与商周不同源两点被视作

① 顾颉刚:《景西杂记(七)》,《顾颉刚读书笔记》第1卷,第357、361页。

② 顾颉刚:《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宝树园文存》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5页[是文刊于《教育杂志》第14卷第4号(1922年4月20日)]。

③ 顾颉刚:《纂史随笔(一)》,《顾颉刚读书笔记》第1卷,第370、371页。关于《王制》《月令》《春秋繁露》的判断是“据修订稿补”,修订稿是否作于《纂史随笔(一)》(1922年4月20日至1922年6月2日)期间尚不确定。

④ 在1922年至1923年5月6日的日记中,集中谈到《诗经通论》的地方有两次:第一次是1922年2月14日至15日,明确说到点读的是皮锡瑞《经学通论》中的《诗经通论》,第二次是1923年3月15日至4月21日,仅录有《诗经通论》而未提著者。根据其言《诗经通论》有卷一至卷十,且在发表于1923年4月10日的《〈硕人〉是闵庄姜美而无子吗?》里提到“近读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加之年谱1923年‘三月至八月一日’一条亦言姚际恒之《诗经通论》,故第二次所说《诗经通论》的著者是姚际恒,与今文经学无关(参见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1,1922年2月14日—15日,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10页;顾颉刚:《〈硕人〉是闵庄姜美而无子吗?》,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3册,第367页;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85页)。

⑤ 顾颉刚:《诗辨妄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1卷,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24页。

⑥ 顾颉刚:《景西杂记(二)》,《顾颉刚读书笔记》第1卷,第227页。

⑦ 班固:《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第4091页。

⑧ 司马迁:《史记》卷二八《封禅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382页。

说明层累说与今文经学联系的关键。在禹问题上,存在其说受康有为与崔适影响两种看法。自1921年至此,未见顾颉刚再次阅读二人著作的记录,而且他对今文经学的总体态度向来一般,若将此时顾颉刚讨论禹的引线归于康有为与崔适,似在说顾颉刚凭其1921年之前的记忆与理解于此时重提了这一问题,相关证法显然不妥。康有为以经与诸子推明提出禹是最古之人而禹前皆出伪托,立足于事实层面的历史本体。顾颉刚则按成书先后排比经部文献,主张禹虽最古但却非人,与三皇五帝一样是否真实存在尚有疑问,着眼于书写层面的历史认识。二者所言本非一意且分属两种范畴。崔适曾说禹的本义为虫名,但没有明指禹是动物,这一说法最早出自《说文》所言“禹,虫也”^①。顾颉刚虽受业于崔适,但不必然受到其直接启发,也没有确凿证据落实这一点。根据他对崔适的态度与对《说文》的征引,不能排除其说径从《说文》中来的可能。经此分析,顾颉刚关于禹的观点与今文经学不构成必然联系。商周不同源问题也是如此。相关研究认为,因皮锡瑞认同齐鲁韩三家以《生民》《玄鸟》《长发》《閟宫》主无父感生之说,顾颉刚亦据《玄鸟》《生民》论商周始祖不同,故后者依从了今文家说。顾颉刚最后一次记录阅读皮锡瑞的著作是在1922年2月15日,其时距离提出层累说尚有一年之久。而且按照层累说的逻辑,在判定《玄鸟》《生民》成书最早的前提下,商周始祖不同是可以直接从文本中自然得出的结论。加之顾颉刚在论证过程中并未取《长发》《閟宫》,又可见其与今文经学思路相异,所以是说非必出于今文经学。除此之外,顾颉刚在这封信里仅谈到“从战国到西汉,伪史充分的创造”^②而未涉及托古改制说。

以上所用史料以日记、书信、读书笔记等体现个人思考过程与私人交流的文本为主,公开发表者仅《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前者提到了托古改制说而相对重要的后者却未言及,这种现象亦可以作为顾颉刚并未予今文经学以特别关注的辅证。综上所述,通过辨析顾颉刚对造伪与托古改制说的认识及其关于今文经学的整体看法,轻言今文经学对层累说显著影响的观点则难以成立。在这些相对琐碎但又必要的论证基础上,若以顾颉刚从谈造伪到论托古改制说再到提出层累说的过程看,发现其自有一以贯之的逻辑,而这又进一步证明了层累说对今文经学的疏离。

坚持史学而非经学立场,贯穿顾颉刚学术事业始终。迥异于今文学家全面否定古文经书的可信性,他始终认为今古文经书各有真伪。这里的“伪”即刻意造伪,“造伪”是传统辨伪学家的普遍认识而非今文学家的独有观念,普遍认识不构成必然联系,而且其论古文经书为伪也未依据今文经学,所以“造伪”无法成为绑定顾颉刚与今文经学的必要条件。如果说《询姚际恒著述书》将沉浸于目录志业的顾颉刚拉回辨伪,那么自1921年4月着手的《诗经》研究则让顾颉刚的辨伪重心从四部集中到经学上来。正是基于大量且具体的辨伪工作,顾颉刚才在东周以上无史说提出近三年后凭借知识积累真正接受了此说,而这也恰是层累说赖以生成的基础。可以认为层累说引发了对上古信史的全面怀疑,但不能说顾颉刚一上来带着全盘抹杀上古信史的预设才有了层累说。无论层累说作为一种假设如何大胆,史料审查这一基色则不应被否认、取消甚至篡改。在此过程中,顾颉刚引入托古改制说作为解释造伪的原因之一。按照斯金纳的“影响”理论并结合上文分析,今文经学中只有托古改制说能对顾颉刚构成“影响”。与东周以上无史说的接受史一样,他认同托古改制说也经历了一番史料审查的过程,是以承认“托古改制”作为一种历史事实的存在为前提的,不带任何经学色彩,与今文经学存在本质之别。层累说是一种理论,更是一种思想。这种带有强烈个性色彩的、他人无法复制的思考^③,同时代学人里只能由顾颉刚来完成。从这一意义上讲,顾颉刚没有误会托古改制说的原意,也没有将孔子改制说改造为诸子伪托说,更没有从康有为那里发展出伪史移用法;不是在拾今文经学之牙慧,而是将其作为一种方法内化到了自己的学术逻辑中。这是对今文经学结构的批判性超越,而不是同一结构的共处。

回归正序发现,在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异质的共识下,与“今文经学促成说”正相反,层累说在生成

① 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08页。

②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65页。

③ 参见王学典:《历史研究为什么需要“理论”?——与青年学生谈治学》,《思想战线》2019年第5期,第56页。

阶段始终与今文经学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今文经学对层累说的影响微乎其微。以二者间观点与思想的相通作为影响成立的根据存有逻辑漏洞。经由学术梳理,某种程度上解构了其间的思想联系。层累说与今文经学相似的地方非必出自今文经学,相似不等于承续,它们或许共享着同一来源或者各有源头。虽然托古改制说确实对层累说构成了“影响”,但顾颉刚并未倚重是说,可以认为倘若没有今文经学,其依旧可以提出层累说。“今文经学促成说”属于溯源证“有”研究,而层累说与今文经学保持距离结论的得出则倾向于证“无”式研究。今文经学与层累说在时序上前后相承且论说确有相似,加之影响的产生具有难以言喻性,常以偶然的、瞬间的而非必然的、持久的形式作用于被影响者,甚至被影响者受到了影响而不自知,另外考虑到文本间的互文特点^①,诸此种种均增加了证“无”难度。在兼顾严谨性的前提下,相比于证“有”的肯定化表达,证“无”更多地呈现为或然性结论,不免有作茧自缚的困扰。若从证“无”的合理处思考,当诸多或然性判断叠加到一起时,“今文经学促成说”的根基已不再稳固。借助柯柯所言确定影响的合理层次这一点,既避免了笼统谈论影响所造成的混淆,又能够增强证“无”研究的说服力。托古改制说被视作今文经学影响层累说的关键,经过如上清理,却发现是说在层累说提出阶段可有可无,那么停留在这一层次的影响则无法撑起“今文经学促成说”。综此来看,保持疏离或许才更贴近层累说与今文经学间的真实样态。

三 顾颉刚的转变与“今文经学促成说”倒置问题的发生

回归历史序列的重访对“今文经学促成说”构成了挑战,但凭既有分析尚不足以完整地回应是说中的倒置问题。在层累说提出阶段,顾颉刚始终与今文经学保持着相当的距离。这种情形在层累说提出之后是否有所改变,成为理解已有研究中倒置问题发生的关键。须继续沿着正向路径清理层累说提出之后的某些症结,方能求得有限度的合理解释,从而恰如其分地呈现层累说与今文经学的关系变化。

1923年7月1日,顾颉刚指出诸子将古人化的行为使得“历史上又多了一层的作伪”,“五帝三王的黄金世界原是战国后的学者造出来给君王看样的”^②,偏重战国及其后的造伪活动。9月至1924年6月^③,《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陆续出版,顾颉刚关于托古改制说的认识在这套书中得到了进一步阐发。他谈到尧舜故事“一部分出于周末学者‘托古改制’的捏造”、王莽“因托古改制而得国”,首次明确将汉代托古改制者指向王莽^④。根据前文的梳理,顾颉刚第一次提及托古改制说见于《中学校本国史教科书编纂法的商榷》,编成的教科书即延续了这一看法。就成伪意图来说,其于1923年11月13日至1924年2月20日间再次申明存在有意造作与无意传误两种可能,其中前者包括“撑场面(如汉为尧后)”“立学说(如《孟子》)”^⑤。此时顾颉刚仍鲜论今文经学,仅于《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的注释里说到《新学伪经考》辨《尚书》甚细;今文经学“怀疑求是的精神更大”,托古改制说“对于几千年来迷信古人的思想起一大革命”,令“他的变法主张找到了强有力的根据”等^⑥。在此之前,他应该已经接触过《孔子改制考》,但首次读于何时并不知晓,1923年8月28日所写“看新买之《孔子改制考》”^⑦是其第一次明确记载阅读是书的记录。与1922年一致,顾颉刚依然没有特别指向诸子“托古改制”,也没有在诸子造伪与“托古改制”间建立起明确联系,但在这里肯定了托古改制说的思想意义。

① “每一份重要的文本或文献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它总是包含着有意无意中取之于人的词和思想,我们称之为互文(intertextuality)。”(赖国栋:《再论“层累说”的来源——兼谈历史与故事的距离》,《福建论坛》2013年第1期,第101页)

②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101页。

③ 《顾颉刚古史论文集》收录是书所作的说明为“1923年6月至1924年2月分三册陆续出版”。核查原书后发现,是书上册出版于1923年9月,中册出版于1924年2月并于6月再版,下册出版于1924年6月并于1925年5月再版。其中,上册版权页显示“中华民国十二年九月初版”与“中华民国十四年十月初四版”,笔者怀疑此处印刷有误,或应为“九月初版”与“十月四版”(参看顾颉刚:《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2卷,第1页;顾颉刚、王钟麒编辑,胡适校订:《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上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顾颉刚、王钟麒编辑,胡适校订:《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中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顾颉刚、王钟麒编辑,胡适校订:《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下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版)。

④⑥ 顾颉刚:《现代初中教科书本国史》,《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12卷,第20、56、185页。

⑤ 顾颉刚:《淞上读书记(五)》,《顾颉刚读书笔记》第2卷,第109页。

⑦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卷,1923年8月28日,第390页。

他对今文经学的评判虽然出现在教科书的注释中,却因托古改制说的缘故而称赞今文经学的怀疑求是精神,而且《孔子改制考》开始出现在日记中传递出顾颉刚意欲再探今文经学的信号。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新举动。此外,顾颉刚的其他论述有助于廓清之前的迷雾。7月1日,他重申“一读古书,商出于玄鸟,周出于姜嫄,任宿须句出于太皞,邾出于少皞,陈出于颛顼,六蓼出于皋陶庭坚,楚夔出于祝融鬻熊(恐是一人),他们原是各有各的始祖”^①,其判定商周异源始终遵循文献第一位原则。如果他认同今文经学在此问题上的看法,那么认同的背后是因为今文经学遵从了文本事实。这与他被动地接受今文家言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

其后,顾颉刚屡屡论及战国造伪问题。比如,他在1924年2月26日提到《禹贡》是“战国时人把当时的地域作一整理而托之于禹迹”^②的作品、在11月24日刊出的《纾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中谈到东周时人托古造伪、本年《泣吁循轨室笔记》里随处可见对战国造伪的议论等^③。是年,顾颉刚言战国造伪延续了之前的态度,而且没有特别述及今文经学。1926年1月27日,他再次说明“我引《说文》的说禹为虫,正与我引《论语》和《吕览》而说夔为兽类,引《左传》和《楚词》而说鲛为水族一样”^④,由此可见其对古史人物属性的认识与商周异源问题一致。这些后出的论述均可佐证前文关于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关系的判断。

截至《古史辨》第一册出版,顾颉刚于1926年5月29日记有“写‘有意无意之作伪’之例十八条”^⑤,关于战国造伪则在6月1日说到夏制九州是“战国的时势引起的区画土地的一种假设”^⑥。这些观点均与此前相差无几。至于今文经学,其所读见于记载者仅皮锡瑞《经学史讲义》,在4月29日至5月1日点读此书期间,他正拟作《整理十三经注疏计划》。该文写于5月4日至6日,其中认为《左传》“本春秋分国之史,刘歆析之,使脱离《国语》而独立,以为释《春秋经》者”^⑦。刘歆析《国语》而成《左传》的观点最早由康有为明确提出,崔适继之。与托古改制说一样,今文经学关于《左传》的看法同样对顾颉刚构成了所谓的“影响”,这一“影响”仍需置于顾颉刚的逻辑中进行理解。1923年初,他谈到“《左传》和《国语》固是记载春秋时事最详细的”,然《左传》“经过了汉儒的几番窜乱”^⑧,其中汉儒窜乱《左传》的判断或立足于“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⑨这一文本记载。另外,《国语》是《左传》之外记载春秋时事最详细的一部书,这样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国语》是人为充实《左传》内容的最主要来源,如此便为他日后持刘歆析《国语》之说埋下了伏笔。顾颉刚从一开始便将《左传》看作史书而非经传,检视是书真伪以及是否与刘歆甚至《国语》有关是从文献出发,看其是否合于历史事实。即顾颉刚是否认同今文经学取决于今文经学结论的得出是否依据历史性的文献以及这些文献是否符合本然的历史事实。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已然不能再将今文学家与顾颉刚相提并论。

1926年6月11日,《古史辨》第一册出版,顾颉刚自述三十余年人生经历与治学次第的《自序》成为焦点。“要介绍我的一系列思想和行动,没有人能象我自己那样完全合格”^⑩,完成于4月20日的这篇长文展现了顾颉刚所理解的辨伪事业与今文经学间的种种纠缠。回忆起初读“两考”的感受,他说到《新学伪经考》“论辩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长

① 顾颉刚:《答刘胡两先生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99页。

② 顾颉刚:《论禹治水故事书》,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210页。

③ 1924年,顾颉刚明确说到“托古改制”的地方似仅有两处,均在《泣吁循轨室笔记》中,一处见于《画鬼易》:“这话骂尽托古改制的人”,另一处出自《金圣叹》:“金圣叹亦托古改制者”,但两处均与诸子托古改制说无直接关联。其中后一处写于1924年11月5日至1925年7月6日间,是否作于1924年尚不确定(参看顾颉刚:《泣吁循轨室笔记(四)》,《顾颉刚读书笔记》第2卷,第248页;顾颉刚:《泣吁循轨室笔记(五)》,《顾颉刚读书笔记》第2卷,第271页)。

④ 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224页。

⑤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第1卷,1926年5月29日,第751页。

⑥ 顾颉刚:《秦汉统一的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2册,第4页。是文刊于《北京孔德学校旬刊》第34期(1926年6月21日)。

⑦ 顾颉刚:《整理十三经注疏计划》,《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7卷,第263页。

⑧ 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3册,第311页。

⑨ 班固:《汉书》卷三十六《楚元王传》,第1967页。

⑩ 吉本著,戴子钦译:《吉本自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页。

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因此,使我对于今文家平心了不少”,而《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即极愜心履理。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虽则他所说的孔子作《六经》的话我永不能信服,但《六经》中参杂了许多儒家的托古改制的思想是不容否认的。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①。之后,他又先后提到“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我的上古史靠不住观念在读了《改制考》之后又经过这样地一温。但如何可以推翻靠不住的上古史,这个问题在当时绝没有想到”“自从读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后,经过了五六年的酝酿,到这时始有推翻古史的明了的意识和清楚的计划”“我的推翻古史的动机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无稽的启发,到这时而更倾心于长素先生的卓识,但我对于今文家的态度总不能佩服”“长素先生受了西洋历史家考定的上古史的影响,知道中国古史的不可信,就揭出了战国诸子和新代经师的作伪的原因,使人读了不但不信任古史,而且要看出伪史的背景,就从伪史上去研究,实在比较以前的辨伪者深进了一层”^②。自沉思至今,《自序》被广泛引作证明层累说与今文经学关系的内证。如何看待后来追溯与当时发生之间的离合,是阐释二者关系有必要澄清的重点。

顾颉刚初读“两考”在1915年至1916年前后^③。对比《自序》与正序梳理其在此时期的看法,发现关于《新学伪经考》学术属性的认识被突显,这一点倒不成问题。根据彼时顾颉刚辨伪古文经书的观点来看,与康有为所论存有交集,那么《自序》强调康有为辨伪古文经书的学术合理性便合乎情理了。但是,有关《孔子改制考》的叙述变化则需要注意。《自序》显示该书对顾颉刚的启发在上古茫昧无稽说与托古改制说。对于前者,他所用“愜心履理”一词意味着其在此前已经认为上古史不可信,这应是毋庸置疑的。王汎森指出,“如果认为《孔子改制考》中的‘上古之世茫昧难稽’是导引顾颉刚怀疑上古信史的主要原因,其实相近似的话早在《列子》的‘杨朱’篇中便已说过”^④,上古茫昧无稽说并非康有为的独创,传统文献早已论及,顾颉刚关于古史无稽的认识非必来自今文经学。王汎森的说法在不经意间反证了上古茫昧无稽说不能对顾颉刚构成实在的“影响”。如果抛开《自序》和王汎森之论,也不难理解顾颉刚何以会怀疑上古史。他与康有为共享着进化论带来的冲击,上古黄金世界的理念不符合演进原则,这样的逻辑冲突促使他们反思传统以达成理性自洽,上古史不可信被倒逼而出。如果没有进化论,很难说是否会产生康有为式的托古改制说,也很难说顾颉刚能否借助此说重审上古史。至于托古改制说对顾颉刚的启发,《自序》与正序梳理呈现出明显差别。他明确谈论是说始于1922年,初读“两考”时则不见论及,《自序》将其接受是说的时间进行了提前。根据《自序》的时间线,1916年及之后,顾颉刚的叙述基本围绕《孔子改制考》展开,几乎没有再提《新学伪经考》。这与正序梳理其于1922年至1924年集中表达托古改制说且对是说的态度并不固定的情形有所不同。此外,与《自序》内容相近,顾颉刚讲述个人经历还见于1924年1月29日致李石岑的信与1925年2月3日所作《答李玄伯先生》,然而均未述及今文经学相关,结合在这前后其对此问题时言时不言的模糊行为,可以推测他有关今文经学的看法仍摇摆不定。这与《自序》形成了鲜明对比。

《自序》是重新排定个人学术史的风向标。“历史学家写下自己的学术生涯回忆录,可与当时构建学术生涯大不相同,这需要两种大相径庭的思维方式”^⑤,作为叙述已知历程的自述,它首先呈现的是顾颉刚在1926年的立场。顾颉刚对确立自己治学思想的来龙去脉所进行的因果推定,使今文经学这一影响因子得到了最具权威的认证,而站在1926年叙说前事,会发现此前隐而未觉的潜流,同时“得

①②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26、36、43、78页。

③ 前文已述,顾颉刚于1915年中旬始读《新学伪经考》,但何时首读《孔子改制考》却没有记录,第一次明确记载阅读该书是在1923年8月28日。《自序》提供了某种线索,根据“我虽是早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暗示,知道这些材料大都是靠不住的”一语的上下文语境,可知顾颉刚迟至1916年听陈汉章授课时便可能已读过《孔子改制考》(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36页)。

④ 王汎森:《古史辨运动的兴起:一个思想史的分析》,第25页。

⑤ 柯文著,刘楠楠译:《〈走过两遍的路:我研究中国历史的旅程〉序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版,第9页。

到充分发展的那一理路就比较容易显现出排他的态势来,那些由偶然性裹成的事物也会仿似必然达致的结果”^①,上述《自序》与正向梳理的差异某种程度上即由此而来。与此同时,这种差异也应置于顾颉刚学术认识变化的过程中去理解。大致以1921年为界,其前期侧重辨伪书而关注《新学伪经考》,后期转向辨伪史而倾向《孔子改制考》。随着辨伪的深入,尤其是层累说提出之后,在古史何以层累造成的解释上,托古改制说得以显明化。顾颉刚关于今文经学的态度随此过程而渐生改变,进而作用于其对过去的追溯,这一自我发现的旅程同样也令其重新发现了今文经学。

《古史辨》第一册出版后,顾颉刚有关今文经学的论述日渐增多。自1926年7月25日起,其阅读今文经学的记录频繁见载于日记。同时,将今文经学作为授课内容,屡见于《尚书讲义》《尚书学讲义》《中国上古史讲义》《孔子研究讲义》《春秋研究讲义》《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其中称赞“康有为之《新学伪经考》,使今古文之真相大白于天下”“‘伪经’与‘改制’二事抓住了秦汉间中心问题,‘两考’是值得称许的学术史著作且崔适所著‘确也有价值’等”^②。此外,他还在《悼王静安先生》里谈到自己受康有为的影响不亚于王国维,并在与钱玄同的通信中放言“大张今文之帜,将来造就了一班学生,不难振起一变相的今文学派”^③。以上种种无不在表露对今文经学的肯定之意。在此期间,顾颉刚似于《尚书学讲义》中首次明确提到刘歆造伪说,之后在致彭炜棠的信及《古代地理研究讲义》《遂初室笔记》《中国上古史研究讲义》里又多有论及。刘歆造伪说虽非今文经学的专利,但得以系统化彰显却要归功于今文经学,与托古改制说一样,顾颉刚接受刘歆造伪说的前提是认为在历史事实层面不能排除刘歆有造伪的可能。他表述是说要远远晚于托古改制说,这一时间差由其辨伪古史自浅及深的逻辑次序所决定,此中关键或与其从“四个打破”触及“三统改制”而关注《左传》《国语》问题有关。其后,至书写《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时期,托古改制说与刘歆造伪说被充分表达,以至于顾颉刚的学术志业再未与今文经学解绑。

层累说提出之后,尤其是《古史辨》第一册出版之后,顾颉刚的研究近乎“古史清一色”^④,其与今文经学的距离被渐渐拉近。托古改制说的地位得到抬升,刘歆析《国语》而成《左传》问题成为今文家言“影响”顾颉刚的新生点。随之而来,刘歆造伪说也逐步明确了自己在古史辨中的位置,今文经学的两大核心概念成为从层累说抵达《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的津梁。同样的,顾颉刚关于今文经学态度的这些转变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伴随辨伪进程认识不断深化的结果。

行文至此,在澄清层累说生成阶段与今文经学保持距离以及是说提出之后顾颉刚与今文经学关系变化的基础上,前述“今文经学促成说”中的倒置问题可以顺而得到解释。言说二者关系的声出现于《自序》之后,尤其是顾颉刚对今文经学的态度发生明显转变之后,其中用以证明二者联系的主要史料选自顾颉刚提出层累说之后的相关论述,而经由正序梳理,层累说提出前后顾颉刚关于今文经学的态度已然有变。那么,若以顾颉刚后来的论述作为判断其此前行为的根据,拿之后相对确定的事实为线索勾勒前事,难免会产生时序倒置的误会,尤其是借此所建立的二者间的思想脉络,某种意义上使得本属未知的进程变作有意识的设计,从而吊诡且巧妙地掩盖了“倒置”的存在。另外,一部分以层累说提出之前的史料来论二者关系的研究,略有将待证的结论视作默认的前提之嫌,此种现象的产生或亦与错置了今文经学对层累说的影响有关。如此一来,将今文经学对层累说的推动性影响倒置为源头性影响,某种程度上夸大了今文经学之于层累说的作用,从而影响到对古史辨学术价值的评判。归于学术路向的正序重访,将倒置的再倒置回去,在提供历史走向多种隐然可能性的同时或许更接近事实本身,并借此表现了历史的复杂面向。

① 李扬眉:《历史学和微观社会的互动——史家自述中的学术与人生》,《史学理论研究》2005年第1期,第111页。

② 顾颉刚:《尚书学讲义》,《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8卷,第50页;顾颉刚:《中国上古史讲义》,《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3卷,第38页;顾颉刚:《清代“经今文学”与康有为的变法运动——中山大学“三百年来思想史”课讲授》,《顾颉刚古史论文集》第2卷,第628页。

③ 顾颉刚:《致钱玄同》(1928年4月12日),《顾颉刚书信集》第1卷,第563页。

④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编著:《古史辨》第1册,第55页。

四 余 论

层累说已经提出了近百年,与今文经学的关系也被讨论了近一个世纪。恐怕连顾颉刚也没有预料到他会与今文经学纠缠到如此境地。二者间的关系研究应为交互式。但“今文经学促成说”的背后或于不自觉中隐藏着一种倾向,即立足于今文经学衡量层累说,其中对今文经学的评断又往往以其政治性掩盖甚至驱逐学术性,失衡的偏颇之下难以给层累说一个恰切的学术定位,故而生发出“今文经学是否促成了层累说”的疑问。对此的回答不是简单的是与否则问题,实质所指不仅牵扯到如何理解今文经学的学术面向,还要求以层累说为轴心回观其与今文经学的关系,而这两点最终指向层累说命题的现代性阐释。

今文经学之于层累说的影响透过托古改制说得以呈现,层累说则借助托古改制说在丰富自身内容的同时增强了理论说服力,但这一影响的显明化发生在层累说提出之后而非之前。历史顺序的“倒置”与否直接与书写二者间关系时的偏差程度挂钩,谬以千里的可能突显了细节澄清的必要。无论倒置抑或正序,若以断裂性而非连续性谈论“影响”,明确二者间的异质性,或许更容易区分二者共享观点的内在差别,以此将层累说从传统学术中剥离出来,确立其归属现代史学的位置。如果因层累说承接了今文经学的认识便将其打入经学阵营,是对二者本质的模糊、混淆与误读。关于二者异质的最佳说明应诉诸“事实”,它们对于何为事实的认定遵循了两套认识逻辑,顾颉刚以一种自律的韦伯式知识观审查文献^①,将今文经学对于历史事实的揭示从与价值事实的缠绕中分离出来,对托古改制说甚至刘歆造伪说的接受均以承认其作为历史事实的存在为先,而抛却二说在今文经学那里作为价值事实的一面。传统经学思维下的历史事实经过现代史学逻辑的过滤被重新发现,以历史事实消解层累于历史事实之上的不同解释,这种事实至上的科学批判精神与今文经学大异其趣,从中可以进一步感受到断裂性所在。倒序映射连续性与确定性,正序发现断裂性与可能性,经由正序的学术史分析尽可能地“使思想史摆脱它的先验约束”^②,有助于解构倒序眼光下将古史辨与今文经学联系起来的思想史线索,终而确定今文经学施予层累说影响的合理层次。如果从断裂性本位进行考虑,那么一面言层累说具有反传统意义,另一面又言其依靠传统汲取资源的两歧性现象则不复存在,更能尽显层累说作为中国首个现代史学理论的主体性价值。

在断裂性前提下,使用“来源”“影响”都将变得谨慎起来。类似语词生来就带有某种指向连续性的隐喻,这套概念系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历史认知的方式,而替代词汇的匮乏令人不得不仍旧借助这些与断裂性不相兼容的文字进行表达,由此对其运用的合理限度提出了更高要求。探究层累说的“来源”、今文经学之于层累说的“影响”便是来源式与影响式思维方式的典型体现。对因果律的执着致使难以对此作出更多的反思,但如何恰如其分地阐释今文经学与层累说两种异质事物间的类似问题则令人为难,尤其是在此问题的背后还牵连到价值判断。正如布洛克所言,“起源的幽灵可能只是真正的历史学的另一个邪恶敌人的变体;这个敌人就是价值判断的怪癖”^③。断裂性本位的提出,便是打破层累说溯源研究路径依赖的一种初步尝试。

那些书写历史的人已经远去,但他们的生命“即刻在其著作中启动另一段旅程”^④。层累说是顾颉刚最伟大的作品,它的出现不仅仅是向历史中“简单地放入一个新东西而已”,许多史学著述的“相对位置都要因它而进行形形色色的调整”^⑤,今日乃至将来之研究都要接受层累说的审视,同时也会

① “韦伯式的学术‘知识’,它表现出一种自律倾向,即以知识自身为目的,故而有谓‘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等等”,在这一点上,顾颉刚与韦伯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参看高瑞泉:《〈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序》,山口久和著,王标译:《章学诚的知识论——以考证学批判为中心》,第4页)。

② 福柯:《知识考古学》,第237页。

③ 布洛克著,黄艳红译:《历史学家的技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1页。

④ 郭震旦:《他仍然值守在八十年代的岗位上》,《读书》2019年第4期,第83页。

⑤ 王汎森:《执拗的低音:一些历史思考方式的反思》,第53页;另参见艾略特著,卞之琳等译:《传统与个人才能:艾略特文集·论文》,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版,第3页。

对层累说作出独属于自己时代的回答。顾颉刚是真真正正沉醉于学术的人,若以因对今文经学的偏见而视层累说为阴谋理论,则是对其最严重的误判。从来如此,不一定是对的。从断裂性再出发,重新看待今文经学的双面脸谱,继续理解今文经学与以层累说为代表的古史辨之关系,或许是忠实于历史的最好姿态。

收稿日期 2022-06-17

作者范静静,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史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山东,济南,250100。

Does the New Text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Contribute to the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Reflections on the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100 Years After Its Proposition

Fan Jingjing

Abstract: The controversy surrounding the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shows its charm as a theory of transition period. The initial criticism of the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did not involve the New Text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e argument that “the New Text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contributes to the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first appears in the chapter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under the Theory of Five Virtues, which is after the first volume of *Ku Shih Pien*—Preface. The theory of direct stratification challenged the theory of Tuogu Gaizhi, and trickled down to every argument of the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while under the joint interpretation of academic history and ideological history it seemed difficult for the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to get rid of the imprint of New Text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However, the multiple conflicts between the existing interpretation and the situation at that time require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Returning to Gu Jiegang with positive narration, we find that in the proposition period of the theory, Gu Jiegang’s attitude towards the New Text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was not as close as it appears now, the theory of Tuogu Gaizhi did not get its favor, and keeping distance was his real state. This situation changed after the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was put forward. The theory of Tuogu Gaizhi and even the theory that Liu Xin forged the Old Text literature were used to enrich the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and Gu Jiegang was no longer stingy to affirm the theory of New Text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This is the reason why the existing research has changed the propelling effect of New Text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on the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into its source effect. The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New Text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in essence, and different judgments of historical facts are the best illustration to distinguish them. Therefore, we need to talk about their relationship on the premise of rupture, only in this way can we fully show the subjective value of the theory of stratification as a proposition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

Keywords: Stratification Theory; New Text Study of Confucian Classics; Gu Jiegang; *Ku Shih Pien*; Theory of Tuogu Gaizhi

【责任编辑 李 恒 吕满文】